

再生 中国

—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

下

李艳 熊志勇 / 编著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再生中国

—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
(下)

李 艳 熊志勇 编著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目 录

六、包产到户：一场饥饿引发的深刻变革 (323)

改革的大潮首先从农村涌起。

农民要种田，种田是要吃饱饭，这是最简单的道理。然而在 70 年代末的中国，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重大政治问题。

邓小平的话意味深长：“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，只要人民吃饱肚子，一切就好办了！”

万里一马当先，举起农村改革大旗。

小岗分田，石破天惊，拉开了一道不可遏制的变革突破口。

邓小平给包产到户“落”了户。

一曲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响彻沉睡多年的神州大地。

6-1 万里主政安徽推出《六条》

小平点拨四川放宽政策 (323)

6-2 借地度荒 包产到户

守者责难 变者力争 (333)

6-3 小岗分田石破天惊

张浩来信乍暖还寒 (340)

6-4 江淮大地“包产到户”一波三折

天府之国“休养生息”成效显著 (353)

6-5 包产到户“落户”

人民公社摘牌 (361)

七、1979：万象更新 (374)

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新纪元，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从此展现在世界面前。

共和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艰难而又恢弘。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，必然导致民族精神的高扬。从思想文化观念、内政外交经济，到生产工具、起居饮食，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。而这场变革的艰辛，更表现在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对新生事物的阻挠和压制。

伴着凤阳花鼓那个催春的鼓点，197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色彩纷呈，高潮迭起；当五星红旗在白宫升起，中美两个曾经敌对隔绝近30年的大国握手言和之际，一个划时代的举措又改变了国际政治的大格局……

7-1 邓公访美 五星红旗升白宫

自卫还击 八一军旗挥南疆 (374)

7-2 红星事件轰动全国

八字方针跃进止步 (402)

7-3 一条血路创特区

一桌火锅唱大戏 (412)

7-4 “四类分子”摘帽

“三家村”人平反 (439)

7-5 小平南巡清除“凡是”

叶帅讲话柳暗花明 (452)

八、1980：政坛风云激荡 (464)

1980年的中国政坛，随着历史的转折显现出深刻的变革。共和国第一冤案平反昭雪，否定“文化大革命”顺理成章。

历史转折的惊涛骇浪，对每个人都是严峻的考验。

邓小平运筹帷幄，众元老鼎力配合。

沧海桑田，
人间正道。

- 8-1 冒风险 为少奇平反
去障碍 “凡是者”辞职…………… (464)
- 8-2 追悼少奇庄严隆重
取消“四大”异口同声…………… (475)
- 8-3 中央书记亮相履新
“永贵大叔”解职赋闲…………… (488)
- 8-4 华国锋职务变动
胡耀邦升任主席…………… (499)

九、拨乱反正完成在 1981 …………… (508)

伴随新年钟声的敲响，龙的传人又迎来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好年头。

现实是对历史的继承和发展。从毛泽东到邓小平，历史在曲折中完成了交替。

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”

高瞻远瞩、深思熟虑，这是巨人评说巨人的襟怀与风格。

公开审判“两案”与正确评价毛泽东，“两难选择”事关全局，拨乱反正系于一体。不是“非毛化”，而是“非神化”，邓小平的睿智与魄力，让人们切身感受到了大转折中“掌舵”的深刻含义。

“两把钥匙”拨开迷雾，六十华诞继往开来。1981 年的中国，终于跨过了那道高高的历史门槛……

- 9-1 “非神化”邓小平把关三要点
写决议胡乔木慎执一支笔…………… (508)
- 9-2 办“两案”彭真挂帅
破禁区 审判公开…………… (529)
- 9-3 答法拉奇邓小平明辨是非
大讨论四千人统一认识…………… (548)

9-4	结审判举世瞩目 惩主犯人心大快	(559)
9-5	华国锋功过时有论 邓小平睿智定乾坤	(579)
9-6	两把钥匙启大幕 拨乱反正开新宇	(587)

引 言

“每一波潮汐，都孕育着一场生命的大躁动……”

“每一轮日出，都完成了一次历史的大跨越……”

1978年岁末，中国共产党里程碑式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——完成了指导思想从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大转移，从而揭开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。

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转折。

近代以来，每逢历史前进的转折点，中国人都再一次复习拿破仑的伟大预言：“中国，是一只酣睡的雄狮。让它睡吧。因为，它一旦醒来，会撼动世界的！”但近百年以来，中国这只东方巨狮时而沉沉大睡，时而似醒非醒。

多少次机遇，与我们失之交臂。

多少回起落，令国人扼腕长叹。

而今，这个曾经拥有辉煌历史、灿烂文化的东方古国，在饱尝了百年凌辱、百年离乱之后，终于把握住了历史给予的这个最后机会，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改革步伐，劈波斩浪驶向新世纪的黎明……

六、包产到户： 一场饥饿引发的深刻变革

改革的大潮首先从农村涌起。大梦之醒，源于“生存”——两个惊心动魄的大字。

农民要种田，种田是要吃饱饭，这是最简单的道理。然而在70年代末的中国，怎样让农民吃饱肚子，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重大政治问题。

邓小平的话意味深长：“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，只要人民吃饱肚子，一切就好办了！”

万里一马当先，举起农村改革大旗。

周曰礼的“绝密件”，找到了对症下药的处方。

小岗分田，石破天惊，拉开了一道不可遏制的变革突破口。

“要吃米，找万里。”

邓小平给包产到户“落”了户。

一曲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响彻沉睡多年的神州大地。

6-1 万里主政安徽推出《六条》 小平点拨四川放宽政策

“理解现实总是准备变革的第一步。”这是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

什·科尔内的一句名言。

认识中国农村的实际，是农村改革的基础。

站在今天的坐标上，回首那场新旧体制转换的历程，最初的起步竟是如此艰难……

1977年6月22日，万里被任命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、省革委会主任、省军区第一政委。就在这一天，他带着中央关于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，离开北京到合肥走马上任。这位当年抓铁路整顿雷厉风行的“先锋官”，此刻又将面对一个更加棘手、更为复杂的重大课题。

上任伊始，万里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，着手“清帮”治皖，很快初见成效。但是，如何改变安徽的落后面貌，从根本上扭转安徽的形势，实现拨乱反正，仍是一桩极其艰巨的历史任务。

地处华东江淮腹地的安徽省是一个农业大省，农村人口占全省人口总数的90%以上。历史上淮河两岸自然灾害频繁，安徽以多乞丐而闻名全国。长期以来人民生活十分困难，温饱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。安徽也是一个长期遭受“左”倾政策严重破坏的重灾区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得不到很好发挥，经济发展缓慢，在全国处于落后位置。1977年，全省28.7万多个生产队，只有10%的队能维持温饱，67%的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，约占25%的队人均年收入在40元以下。大部分农民吃不饱，穿不暖，有的仍在饥饿线上挣扎。

百废待举，从何入手？带着沉重的思考，万里上任三个月，巡行3000多里，首先深入农村，体察民情，了解民心。

万里下乡调查，不搞前呼后拥，亦不惊动基层。他喜欢微服“私访”，通常是不打招呼，不带随行人员，想到哪儿就到哪儿。他认为这样看得真切，听得真实。再就是不开大会，不作指示，不提口号，只是看、问、听。

万里巡行调查，车上除了秘书或警卫，加上司机之外，还有一位记者。他就是新华社常驻安徽记者张广友，而他与万里是在1976年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”时在铁道部“蹲点”相识的。从那以后，两人便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万里到安徽任职，张广友也因万里建议而调到了安徽。凭着

记者的敏锐和共产党人的忠诚，他积极参与了安徽农村改革的艰难历程。

那年冬天，万里一行4人走访了皖南的芜湖、徽州、池州三个地区十几个县（市）。此后又到了淮北的阜阳和皖东的肥东、定远、凤阳、嘉山。

一路走访，一路思考。所见所闻，令万里的心情愈发沉重。

一次，他来到一户农民家里，见到了蹲在锅灶口的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，便主动亲热地同他们打招呼。

可是万里连喊几声“老大爷”，对方都没有反应，仍然蹲在原地不动。这使万里感到很纳闷。

当陪同人员告诉老人：这是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，老人才缓缓地站起身来。

这一下万里却惊呆了——眼前的这位老人竟然下身赤裸，没穿裤子！另外两位年轻的姑娘也同样没裤子穿，只好蹲着原地不动。

村里人说，这地方有的全家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，天气太冷时，就只能这样坐在灶口取暖。

看到群众生活竟如此贫困，万里深有感慨，心情沉重地说：“我们革命这么多年，老百姓还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！”何颜以对？问心有愧呀！

万里深入基层访问，不太满足于那些“莺歌燕舞”、“形势大好，不是小好”之类的汇报，他要掌握真实的第一手材料，以此作为决策的依据。

眼前的事实是：建国快30年了，山河面貌依旧，农民群众的生活没有多大的改善。

对此，邓小平很坦率地说过：“在没有改革以前，大多数农民是处于非常贫困的状况，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。”1977年全国人均占有口粮低于1957年，农村有1亿多人的口粮不足。

万里皖南3000里巡行所了解的情况，更加证实了这一点。

在淮北阜阳农村，一些农民过年连一顿饺子也吃不上。农民吃的是用地瓜面和胡萝卜缨子煮成的、散发出难闻气味的黑糊糊。

在肥东，万里听到一位农妇的抱怨是：“这年月，日子困难，不好过，没法子！”她家的全部家当还不值30元钱，一根木棒就可以全部挑走。

在定远，当万里问一位年轻农民有什么要求时，他打开破棉袄，拍拍

肚皮说：“没有别的要求，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！”

万里再问他还有什么要求，这位青年汉子又一次撩起破棉袄，拍着肚皮说：“里面少装点儿山芋（红薯）干子！”

多么质朴的语言。摆脱饥饿，维持生存，这是最起码的要求，也是最实际的企盼。

更让万里难过万分的是他的金寨之行。

金寨，是红军时期的老革命根据地。在革命战争年代，根据地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前仆后继，流血牺牲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过巨大的贡献。

万里深入深山老区，看望一些老红军和红军烈士的亲属，当见到他们那种生活贫困凄凉的境况时，万里十分沉痛，不禁流下了眼泪。

大别山区穷，过去只是听人这么说，但怎么也没想到会穷到这种地步。他当即决定给金寨县拨救济款120万元，棉花14.5万斤，棉布108万尺，粮食50万斤，救济老区贫困户。

在万里深入农村调查的同时，顾卓新、赵守一等省委领导人都带头亲自下到基层调研。经过认真的调查、研究和充分的讨论酝酿，一项治穷解困的重大措施终于出台。

1977年11月，安徽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。万里在会上发表了一段动情的讲话。他说“中国革命在农村起家，农民支持我们。母亲送儿当兵，参加革命，为的什么？一是为了政治解放，推翻压迫在身上的三座大山；一是为了生活，为了有饭吃。现在进了城，有些人把群众这个母亲忘掉了，忘了娘了，忘了本了。我们一定要想农民之所想，急农民之所急。”一番肺腑之言，表明了他对人民群众的赤诚和解决农村问题的决心。

他清醒地看到：安徽是农业省，农业搞不上去问题可就大了。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，农业一落后或遭了灾，就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，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，更不用说实现四个现代化了。把农业搞上去，关键是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；而要调动积极性，一个靠领导，一个靠政策。农村中心问题是把农业生产搞好，凡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做法和政策都是错误的。要制定好的农业政策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，走群众路线。

万里在这次会议讲话中特别提到的“一个规定”，即中共安徽省委制定的《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（试行草案）》（简称农村《六条》），它是粉碎“四人帮”后徘徊的中国所出现的第一份关于农村政策的开拓性文件，亦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信号。说起这份文件的出台，不能不提及当时担任省农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周曰礼。

周曰礼是扛着大盖枪参加革命的。在此之前的5年铁匠生涯铸就了他铁一般的性格。合肥解放后，他在皖北军区司令部任机要员。在那里，他认识了军区政委曾希圣，并给曾希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后来，曾希圣当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，便指名调周曰礼到身边当秘书，而且一当就是三年。出身农民、了解农村的周曰礼，在60年代初安徽的“责任田”试点中曾经有过一段难忘的经历。

1961年2月，曾希圣带领工作组到合肥市巴市郊蜀山公社南新庄生产队搞“责任田”试点，周曰礼就是其中一员。

责任田在这个极为贫困落后、处于饥饿之中的小庄子里产生了积极的结果，周曰礼等人起草了一个试点报告上报省委书记处。不久，他又参与起草了省委关于试行“责任田”的有关文件和给党中央、毛泽东的报告。

当时的安徽处于粮食短缺严重，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。继续实行“一大二公”的政策，显然难脱困境。这种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的责任田，对于度过饥荒确实起到了“起死回生”的作用。

宿县有一位70多岁的老农，儿子因病不能参加劳动，本人又不肯当“五保户”，于是向公社党委书记要求带儿子上山开荒、种地和休养。

公社书记壮着胆子答应了他的要求。

一年下来，父子俩靠一把铁锹、一把四齿钩，开荒16亩，收粮3300斤，扣除自用，上交粮食1800斤，现金60元。事实说明，天灾固然是造成饥荒的重要因素，但“人祸”的影响恐怕使为主要。

这位老汉的现身说法，让其他农民看到了免于饥饿的希望。他们纷纷向社队干部提出了“把田包给我们种”的要求。

对于责任田，毛泽东最初是同意试验的。但是，随着他对“资本主义复辟”危险的忧虑不断加剧，态度也随之转变。

他指责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是刮“单干风”，“犯了方向性错误”，将其当作小生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加以制止。

八届十中全会后，包产到户更被当作“两个阶级”、“两条道路”尖锐斗争的靶子进行严厉批判。曾希圣和支持这一做法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被撤职，全省上下许多人因受牵连而遭到了批判。周曰礼是责任田的推行者之一，自然也免不了挨批斗。

虽然责任田在政治斗争的高压下被“改正”，但是经过这次试点，周曰礼深知包产到户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，也是走出困境的有效途径。万里主政安徽，抓农业生产，身为农委政研室主任的周曰礼终于有了用武之地。

当年，大寨是中国农村值得效仿的样板。然而，最初的“农业学大寨”，到后来却逐渐异化成执行“左”倾错误政策的同义语。席卷全国的“农业学大寨”和“普及大寨县”运动，不仅对中国农村，而且对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学不学大寨，已不是一般的农业生产问题，而是事关举什么旗、走哪条路、执行什么路线的“大是大非”问题。在省地县各级党委机构中都专门设有“农业学大寨办公室”，而这个“大寨办”几乎取代了原来农委的职能。

1977年冬，万里在安徽开始搞农村改革时，“两个凡是”仍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。按照建设大寨县“六条标准”解决“五种人”的问题，从生产队向大队核算过渡，仍然是农村工作的指导方针。1977年11月16日，中央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，讨论包括向大队核算过渡在内的12个问题。会后中央发布的1977年49号文件指出：“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”，“今冬明春，可以再选一部分条件已经成熟的大队，例如10%左右，先行过渡”。经过层层动员，全国各地刮起了向大队核算过渡之风。

在安徽省，“大寨办”和农委这两条线，都直接通向省委，都在争取第一书记的支持。万里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与安徽农村的实际十分了解，对那些“假大空”和报喜不报忧的材料很不感兴趣。他找到受冷落的周曰礼，同他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。周曰礼对1961年那段“起死回生”的历史记忆犹新。他直人快语，一针见血地指出：发展农业生产，“根子

是政策问题，是人和土地的关系问题”。语不惊人，但却牢牢地抓住了根本。

没有利益驱动，怎么能有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？在 50 年代的特定条件下，靠着革命激情，可以不计报酬，可以勒紧裤带干社会主义。但是，勒一天、两天可以，勒裤带时间长了，精神上最初的激情也会消失。当时农村广泛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：“男劳力上工带打牌，女劳力上工带做鞋”，“头遍哨子不买账，二遍哨子伸头望，三遍哨子慢慢晃”。

事隔不久，为了给省委的决策提供确实可信的依据，省农委起草了一份反映农村极左路线危害严重的“绝密件”呈送万里。这份有违时尚的“绝密件”列举了“浮夸、瞎指挥、大搞形式主义”等问题，并以一些确凿的数据和触目惊心的事实为佐证，很有说服力。万里认真地看了这份“绝密件”，特意叮嘱周曰礼：“你们能否搞个针对性的政策意见？”须知做这样的事在当时是冒极大政治风险的，但周曰礼却知难而进。

为了起草这份有“针对性”的政策意见，周曰礼带着一千人马去了滁县地区。

滁县地区气候温和，交通发达，是个物华天宝、人杰地灵的好地方。令人叹惜的是，从 1958 年到 1977 年的近 20 年间，全地区的粮食总产量和农业总产值年递增率分别仅为 2.2% 和 2.61%。其中定远、凤阳、嘉山三个县，不少社队人均口粮只有 300 斤左右，人均年收入只有 50 元左右。全区大批农民外出逃荒。如此年复一年，恶性循环，农村已陷入焦灼的境地。

经过认真调研，他们集体起草了这份触动中国农村改革神经的红头文件——即前面提到的中共安徽省委的农村《六条》。

《六条》的主要内容是：（一）搞好农村的经营管理，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，可以组织作业组，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；（二）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；（三）减轻社队和社员负担；（四）落实按劳分配政策；（五）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、集体和个人利益；（六）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、家庭副业，开放集市贸易等。其中的不少内容突破了“左”的禁区，最重要的是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

权，自主权的实质是要生产者真正当家做主，摒弃瞎指挥和不切实际的花架子。《六条》中反映出的基本精神是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，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精髓。

在1977年11月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，参加会议的省、地、县委领导人围绕《六条》逐条进行讨论。讨论中的思想交锋相当激烈，有人说《六条》“不是社会主义方向”。

有人说，《六条》“给农民的自主权太多啦！”

“这样下去，会不会滑到1961年……”

由于持反对和怀疑态度的人不在少数，原先准备写进去的一些政策性更宽的条文，不得不暂时搁置起来。

面对遇到的阻力，万里表现十分沉稳。他叮嘱农委：“不要勉强！有些同志思想不通，要耐心等待，因为具体工作还要靠下面的同志去做。如果硬写进去，他们接受不了，反而会把事情搞糟。”

经过修改的省委《六条》一经发出，很快轰动了全省，继而震动了全国。《红旗》杂志社、《人民日报》社和新华社纷纷派出记者到安徽采访。

安徽农村自此冲破了由于“左”的束缚造成的“万马齐喑”局面，伟大的中国农村改革实际上也从这里拉开了它波澜壮阔的历史序幕。

1978年2月3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在一版显著位置以《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》为题，发表了该报记者姚力文和新华社记者田文喜所写的通讯，对安徽省委《六条》作了报道介绍，进而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

《六条》在安徽农村宣讲贯彻过程中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。在各地召开的群众大会上，男女老少兴奋地静听宣读文件。每当念到喜欢听的关键地方，如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时，台下就有群众高喊：“再重念一遍这句话！”“念慢点！”

文件刚念完一遍，一些群众就喊：“再念一遍！”虽然当时天寒地冻，但群众却兴奋地说：“听到新精神，天冷心里热！”

记者问一位农民：这《六条》哪一条你最高兴？

这位农民回答：“我都高兴。最高兴的还是养鸡、养鸭、养鹅不受限制了。今后大概也不会再‘摸鸡笼子’、‘砍鸡头’了吧？”

台上台下形成了强烈的共鸣，显而易见，只要政策对头，就能把群众中蕴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释放出来。有了好的政策和路子，加上农民群众的主动创造精神，就一定能走出困境，把生产搞上去。

安徽省委的《六条》制定后，邓小平即给予了热情肯定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，他考虑的是一个更加宏大的改革战略。因此，必须把安徽农村改革的星星之火引向全国。

1978年2月3日，也就是《人民日报》推出安徽省委《六条》诞生的重大消息的当天，邓小平从成都起飞，出访尼泊尔。此前在四川停留期间，邓小平向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介绍了安徽的《六条》规定。他的点拨很精当：农业的路子要宽一些，思想要解放，只是老概念不解决问题，要有新概念……只要所有制不动，怕什么！工业如此，农业如此。要多想门路，不能只在老概念中打圈子。

这使人们联想到邓小平那个著名的“猫论”，以其生动形象的比喻，给人们留下了无限丰富的创造性思维空间。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评价说：邓小平非常直爽，从不拐弯抹角。中国有这么一个非常实际的领导人，无疑是民族之大幸。

邓小平关注四川，因为这个全国占人口总数十分之一的农业大省，对于治国安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有道是“天下已定蜀未定，天下不乱蜀先乱”，自古以来就有“治国必重蜀”的说法。

摆脱农业困境，在号称“天府之国”的四川乃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。十年“文革”浩劫和极左路线的干扰，“天府之国”被搞得人心涣散，民不聊生，丰腴的土地却结不出丰盛的果实。饥饿同样威胁着那里的农民。

全省农业管理混乱，相当多的生产队成本无核算，账目不健全，单是历年累计的超支欠款一项，就达6.8亿多元，超过全省人民公社两年公共积累的总和。粮食生产的实际情况是一年不如一年，致使这个农业大省到后来根本就调不出余粮，连维持本省人民的温饱都成了问题。要解决四川的农业问题，政策是否对路同样是关键。

四川省委从1977年下半年起，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开始